

# 翻译写作:译者与作者的和谐共生

黄 燕,谢 芳

(四川理工学院 外语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译者与作者的和谐共生关系指明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兼有的双重身份,实质上是提出了构建翻译写作学的理论体系。翻译写作学的构建需要借助写作学的基本原理,在翻译过程中采纳并运用写作学“感知—运思—表述—检查”的核心机制,整合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从西方经典语言学中,包括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关联理论、认知语言学等直接受益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和思路,并融合中国传统译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所提出的译事标准,明确翻译写作新过程,完善翻译写作学的基本建构。构建翻译写作学的目的即是对译者和作者长久以来身份之争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为实现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真正结合而提供了途径,旨在呼唤对高质量翻译的重视,切实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关键词:**翻译;写作;翻译写作学;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4)03-0058-06

## 一、引 言

我国的翻译研究出现了一股回归的浪潮,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重翻译的应用理论研究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对翻译纯理论的重视,再到近年来不少翻译理论家及学者主张向翻译应用理论研究的回归(如郭建中教授早在 2002 年 8 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英汉语对比与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要既重视实践,也重视理论。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中国翻译研究浓墨重彩的背景之下,翻译理论风起云涌之时,不少学者仍在质朴地寻求:高质量的译文在哪里?高质量的译文是怎么做出来的?曹明伦教授也无奈感慨道翻译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理论、原则、技巧的发展有破竹之势,然而高质量的翻译却是凤毛麟角。毕竟翻译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

---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2SA210)

**作者简介:**黄 燕,硕士,讲师(E-mail:41799038@qq.com)

对于翻译这门重实践的学科,是什么在决定着译文质量的优劣、译文水平的高低呢?郭建中教授在总结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后体悟出英汉、汉英翻译的真谛为“重写”或称为“重新表达”。这就需要译者用目标语对源语进行重新表述,凸显翻译与目标语写作的紧密关系。杨士焯教授在继续发展“翻译是重写”的概念之后,于2006年率先提出“翻译写作学”<sup>[1]</sup>理论,其目的就是要回答“怎么译”,“怎么译得好、译得妙”等翻译实践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而该理论自提出之后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本文旨在阐释“翻译写作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机制,讨论如何协调翻译过程中译者既作为“译者”又作为“作者”的双重身份,促使“译者”和“作者”在翻译写作学的理论框架中和谐共生。

## 二、翻译与写作的关系

在理解翻译写作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机制前,有必要对翻译与写作的关系做充分地了解。翻译绝不是一种任意发挥、随心所欲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语言文化行为。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始终伴随着翻译行为的存在,且二者相互交融,缺一不可<sup>[2]</sup>。杨士焯教授于2006年在其编撰的《英汉翻译教程》第四章中明确指出“翻译即写作”,翻译就是再创作,进而在第八章提出并论述了建构“翻译写作学”理论的可能性。之后,部分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翻译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林莉莉于2009年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以下观点:她首先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三方面明显的不同点。首先,写作是独立性的,作者可根据现有作品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写作素材,但对于“带着脚镣跳舞”的译者来说,他们必须忠实于源语文本的内容和题材。其次,就与读者的关系方面来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较译者而言更为直接,前者不需要任何的媒介,而后者则需要通过译者作为读者与原作者沟通的桥梁。第三,作者可将其直接经验倾注于作品中,而译者需要做的却是语言上的转换<sup>[3]</sup>。然而,翻译与写作之间的区别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不论是作为作者抑或是译者,在提笔之前都需要以长期的阅读为源泉,以不断的实践为保障,还需要融入自己的主观性对作品进行创作或是再创作,且两者在此创作过程中会历经相同的思维过程——感知、运思和表述。

## 三、翻译写作学的翻译理论基础

### (一)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基础

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直接受益于语言学中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者力求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关联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科学地阐述翻译的等值性、可译性等最基本的翻译问题。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框架和思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方法。其中贝尔的翻译过程和写作说及德利尔的翻译定义与阐释理论对翻译写作学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罗杰·贝尔(Roger Bell),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属于彻底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派。贝尔试图用系统语言模型描述翻译过程和译者的知识结构,并提出“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

语篇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sup>[4]</sup>。对于译文的“形式等值”或“功能等值”的两难选择问题,贝尔认为译者可以问六个“忠实的仆人”：“什么？”(文本中包含的信息)，“为什么？”(信息发送人的目的)，“什么时候？”(交际的时间)，“怎么样？”(交际态度和媒介)，“什么地方？”(交际的地点)，“什么人？”(交际的参与者)。语言作为一种具有各种特征代码的属性,使其创造以表情达意的文本成为可能。

据此,贝尔提出了翻译过程的最简模式,即首先对源发语语篇进行分析;其次解读语篇,累积所有的语义表征;最后对新目标语语篇进行合成。最简模式的提出等于对译者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求译者具有编写文本的能力;第二,要求译者具备对两种语言的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贝尔对翻译过程的论述以及对写作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的阐述可谓是对翻译写作学的建构提供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是难能可贵的。

释意派理论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让·德利尔(Jean Delisle)。在其专著《释意翻译探究》(Transl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中他提到:“实用语篇翻译是基于写作技巧上重新表达的一门艺术。翻译是基于写作技巧和两种语言知识上的重新表达的艺术”(The translation of pragmatic texts is an art of re-expression based o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re-expression based o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a knowledge of two languages)<sup>[5]</sup>。此言论是对翻译写作学建构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德利尔眼中译者即作者,其共同之处是两者都需要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有形可见的文字,并且以准确无误的方式有效的传达给读者。最好的翻译就是读来最不像翻译或是伪劣之作的作品。翻译过程被分为理解,即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即用目的语对源语文本的重新编码;以及核实,即审核三个阶段。德利尔提出的翻译过程的三阶段既能激发译者的思维,也能激发译者作为作者的写作能力。

贝尔的翻译过程和写作说、德利尔的阐释论和翻译定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研究的重点都从翻译理论过渡到对译者以及翻译过程的重视。在贝尔看来,要研究译者“那个小小的黑匣子”,通过认知模式,把译者个人的、私有的程序知识外在化。德利尔则直言要把译者作为翻译操作的中心,使译者了解翻译的动态。二者的观点都有利于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翻译对西方翻译学来说是科学,其对翻译过程中“怎么译”的问题解释的入木三分,但翻译对中国传统译论来说则为艺术。笔者将在下文的论证中探究中国传统译论如何对翻译写作学的建构做出贡献。

## (二)中国传统译论基础

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解,用王宏印的话说:“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础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以有别于别国的译论”<sup>[6]</sup>,其对翻译写作学的建构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依据和素材。中国传统译论所关注的焦点以从西方翻译学的“怎么译”升华到“怎么译得好”、“译得妙”的问题,这正与建构翻译写作学的初衷一致。

翻译文学家林语堂在其近万言的《论翻译》(1932)一书中详尽、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翻译

理论。在书中,他不仅为翻译定下了三条标准:即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好标准,而且还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其所依赖的首先是译者对原文文本和内容的透彻了解;其次是译者自身的国文水平,“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再次是译者翻译实践能力上的训练,译者需要对翻译标准和技巧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sup>[7]17</sup>。林语堂将“能清顺畅达的中文”一条排到了第二的位置,并指出作文时的心理和翻译时心理在构思这一层面是相同的。

翻译“神似”论的提出者傅雷也是翻译艺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自己长期的翻译经验,提出译文要求“传神达意”<sup>[7]987</sup>,所谓“传神”,就是要体会原著,将原著中的人物、性格、情节,连同思想、感情等化为我有,这样的译文才能形象逼真、高屋建瓴、下笔有“神”。“达意”指译者表达的功夫,要求译者对于中西两国语言(源语和目的语)能融会贯通。傅雷曾明确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sup>[7]988</sup>,化为我有,形诸笔墨。

以上笔者从东西方翻译学角度出发探究了翻译写作学建构之理论基础。鉴于翻译写作学的学科交叉性质,笔者在下文将着眼于探讨翻译写作学建构的写作学机制。

#### 四、翻译写作学的写作学机制

周姬昌在其书《写作学高级教程》中提出了写作内容的三大核心系统,即“感知—运思—表述”<sup>[9]</sup>三大过程。林莉莉<sup>[9]</sup>的研究证实了译者在翻译的创作过程中会历经相同的思维过程,即感知、运思和表述。结合海耶斯和弗劳尔于1980年提出的写作过程模型图,除了上述三个写作过程以外,还应加上认知监控(cognitive monitor),即检查。翻译写作也是一个从感知到运思再到表述的系统过程,最后一步的检查是对前面三个步骤的重要补充。

##### (一)感知

感知是感觉和知觉的合称,构成人类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对于作者而言,此阶段发生在写作之前。一篇好的文章首先需要的是作者对工作素材不停的积累和理性的选择,即感知。在准确、充分的感知驱动下写出的文章才有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作者的感知既包括情感感知也包括理性感知,既有直接感知也有间接感知。

与写作相同,翻译同样需要准确、充分、敏锐的感知。翻译是以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理解为出发点的,理解的程度越深,翻译的过程就越顺利<sup>[9]</sup>。换句话说,在着手翻译之前,需要对目标文本以及与目标文本相似的文本进行筛选、积累和理解,这样才能忠实于对目标文本的理解。

翻译的感知与写作感知不同的地方在于,翻译感知更具目标性和针对性,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在写作思想、写作意图、写作风格、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方面进行感知,力求与原文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形成心灵的共鸣,为实现高质量的翻译奠定基础。而写作感知则相对更为随意、灵活、主观。

##### (二)运思

运思是感知与表达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即作者或译者在写作或翻译之前运筹帷幄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互相渗透、转化、完全融为一体的双向运动。此过程以感知为基础,并再次证明不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不是一个线性过程的理论。在运思过程中,作者或译者都需要历经肯定和否定相互交替的过程,而且此过程将会贯穿写作或翻译的整个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写作和翻译遵循着几乎相同的程序,包括作者或译者对整个语篇立意定体、选材取事、构架谋篇的整体运思以及作者或译者通过对文章细节进行缜密思考,步步深化和细化的局部运思。所不同的是,译者的运思基于原文、受制于原文,而作者的运思则比较随性。

### (三)表述

表述是产出阶段,是将感知成果化、运思符号化的过程。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成熟的观点或思想都希望得以口头上或文字上的表述。表述对于思维来说,也并非被动的、机械的语言文字的转录,而是始终伴随着主体非常活跃的心理活动。因此,表述阶段并非意味着感知和运思阶段的终结;相反,这三者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向前发展。然而,表述也并非一种完全自由的活动,无论是写作的表述还是翻译的表述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首先是写作或翻译过程中的视角问题。三种不一样的人称决定了写作或翻译过程中三种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暗示着主观的视角,但长于能对语篇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做细致入微的描述。第二人称的视角中作者似乎是隐藏着的,但却在隐隐中介入到整个事件中。第三人称带来客观的视角,将“我”置身事外,行文时享受了极大的自由度和客观性。其次是对语言的控制,不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在驾驭语言时,都不能恣意为,信马由缰。表述是否顺畅、流利,传情达意,使读者不囿于语言表达的理解障碍;表述分寸是否恰当,是否与内容及文体相符,是否易于被读者所接受;表述之笔法是否灵活,这些问题都是作者和译者在语言控制时需关注并遵循的规则。再次是文章的连贯性。从内在方面来说,文章能打动人、折服人、使读者与之共鸣,严密的逻辑性是实现以上方面的必然要素。而适当的音节、恰当的语气、文章形式上的精妙则是从外在方面实现文章连贯性的保障。

### (四)检查

检查从理论上来说是写作过程和翻译过程的最终阶段。检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作者已创作完成的作品或译者已翻译完毕的作品按照某一标准进行重新审视以实现作品的日臻完善。基于此,检查包括评价和改正两个阶段。前者指根据某一标准对业已完成的作品进行再阅读、再判断;后者是指对写作和翻译作品中在评价阶段产生的问题进行修订、更正。这里所谈的检查与上文提到的德利的核实阶段有相似之处:都要求作者或译者根据相关的标准对表述生成的文本进行检查和评价,必要时做出改变或修正,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语篇力求完美。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在检查的实施阶段需要对语篇从语言表述、遣词造句、内容风格等方面进行重新审视,且检查并非只发生在最终阶段,相反,会出现在写作和翻译的任何时候。

总的来说,写作和翻译会历经大致相同的过程。首先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始于感知,此过程要求作者或译者能够合理地选取素材,摄取、贮存各种信息。第二对素材进行充分、准确的感知把握后,作者或译者都需要对文本进行运思,辗转反复于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中,并且需要对语篇进行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缜密把握。表述对于作者或译者来说都是一个活跃的和充满创造性的过程,是对感知和运思的成果化和符号化,而检查则贯穿于写作和翻译的整个过程。

## 五、结 论

翻译写作学是一门崭新的将翻译学与写作学进行交叉建构的学科,也是对“译者”与“作者”长久以来身份之争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关注的焦点是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家忽略的基本问题:怎么译、怎么译得好、译得巧?其目的是呼唤对高质量翻译的重视,切实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正如刘宓庆教授所言“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sup>[10]</sup>。作为“作者”的“译者”不必再为恪守严格的对等翻译原则而顾此失彼,在翻译写作过程中,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其间既有继承也有破坏,既有肯定也有否定<sup>[11]</sup>。希冀翻译写作学理论的提出能在真正意义上使我国的翻译研究走上纯理论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相互促进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郭建中.简评《翻译写作学》[J].上海翻译,2012,(3):79-80.
- [2] 唐健禾.翻译行为限制性与创造性的文化透视[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0-64.
- [3] 林莉莉.写作视角下的英汉文学翻译[D].厦门大学,2009.
- [4] Roger T.Bell.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
- [5] Jean Delisle.Translation:An Interpretive Approach[M].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8.
- [6]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7] 罗新璋.翻译论集[G].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8] 周姬昌.写作学高级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 [9] 韦忠生.主体间性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策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10):88-93.
- [1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 [11] 梁建东.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与翻译[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00-103.

责任编辑:梁 雁

## Translational Writ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HUANG Yan, XIE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ranslator and writer is the dual identity of a translator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hich in essence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Its construction need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basic processes in writingology: perception, thought operation, expression, and reviewing. Besid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deas directly benefited from western linguistic tran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pragmatics, relevance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etc., along with translation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also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The aims of its construction are firstly to settle the long dispute over the real identity of a translator, and secondly to provide a way to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so as to appeal for more emphasis on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works and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abilit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writing; translational writing; Western linguistic translation theorie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